



刀
鋒
文
丛

张 柠 主编

李 怡◎著

被围与突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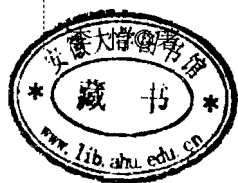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

刀锋文丛

张柠 主编

被围与突围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围与突围 / 李怡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7

(刀锋文丛)

ISBN 978-7-5624-6425-9

I. ①被… II. ①李…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②巴蜀
文化—文集 IV. ①K203-53②K871.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3796号

被围与突围

BeiWei Yu TuWei

李 怡 著

责任编辑: 李金正 版式设计: 上海六点文化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制: 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25 字数: 178千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425-9 定价: 20.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总序

文化批评的中国化实践

批评丛书“刀锋文丛”，是一套主要针对当下中国文化现象（包括文学、大众文化、影视、音像、传播媒介等）进行批评的丛书，作者为各领域的学者和新锐批评家，他们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学有所专，在批评技术上训练有素，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取胜，并力图借此实现批评的独立价值。他们对其批评对象，不做一般意义上的“解剖学分析”，而是更加关注作为批评对象的符号系统如何潜入当代文化，以及潜入过程中产生的怪异踪迹。

对于文化批评而言，其批评对象是一个巨大的疑问。文献意义上的传统符号体系与文化商品意义上的新符号体系，早已在全新的传播媒介中胜利会师，并拉帮结伙地向人示威。它们在街道上招摇过市，在电视节目中口水四溅，在策展会上沐猴而冠，在各种叙事建构中钻头觅缝。通过对其他文化DNA的吸纳和重组，它们已经具备了高度的变异能力，是一种可怕的文化“异形”。它们以新的宿主为掩体，摧毁传统意义上的解剖学和阐释学。要将它们从新媒介这个宿主之中剥离出来，使之原形毕露，是文化批评的重要任务。

因此，作为“微观意识形态”的一根敏感的神经，文化批评不再是书斋里的解剖学，批评者也不再是历史的建筑师和形而上学的幻想家，更不是神话和象征的合谋者。他们应该是文化相面师，是经验分析的数学家，是新的

寓言写作者，是砌筑文化符号沼气池的工匠。语言创造是他们的工具。想象力是他们的显微镜。新的分类学就是他们的方法论。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写作性的批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批评“中国化”实践的开创性工作。

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和思潮，文化批评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冷战思维”在文化中的反映。宏大意识形态的微观化，促进了批评方法的更新。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细读方法与符号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结盟，构成了文化批评的方法论谱系。与此同时，文化批评也不是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后者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文学问题。而文化批评，如果它要讨论文学（或者其他文化现象）的话，就是要将研究对象转化为公共领域的话题，成为公共领域话语批判的对象。

有学者将文化批评的特点总结为：一、注重当代文化而不是历史经典；二、注重大众文化而不是精英文化；三、注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群体（比如女性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青少年文化、打工族文化等）而不是主流文化；四、注重文化与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封闭的、象牙塔式的、静态的分析研究；五、提倡跨学科超学科的、综合思维的研究方法。^[1]我认为这个总结比较全面。它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当代的、大众的、边缘的、动态的、综合的。换一个说法，作为传统文学的“文学性”，已经像碎片一样消散在另一个新主流文化（市场和消费）之中，文化批评就是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中重新发现“文学性”，在“现代性”中寻找那些“可以挽回的部分”，在市场的垃圾堆里寻找“文学性”的碎片。

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过所谓的“文化热”，但与这里所说的“文化批评”关系并不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文化批评”理论著作。但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还正在探索的途中。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理论，所有文化批评的方法，都是“拿

[1]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前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来”的外国货。一些概念是否适用于我们的文化批评，需要甄别；文化批评中对经验的把握，需要探索和实验。这些都需要通过长期的批评实践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它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符号作为历史经典的出场，往往成为常态。我们的文化批评，还面临着对历史符号进行解码的艰巨任务。无论理论还是方法，都应该从写作实践中来。我们不要被那些貌似严密的仿西化理论吓住。我们应该对批评写作的中国化实践表示敬意，哪怕它的创造是点滴的！

我大致从2000年前后开始文化批评的探索性写作，2003年完成第一本显得幼稚的文集《文化的病症》。在2004年开始筹备文化批评丛书“刀锋文丛”的出版事宜。第一辑于2005年出版，收入了朱大可等人的文集。第二辑于2006年出版，收入了陈晓明等人的文集。由于出版社改制，丛书原责任编辑调离，“刀锋文丛”出了两辑就停下来了，我感到非常遗憾。这一次有缘与重庆大学出版社合作使“刀锋文丛”重获新生，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第三辑“刀锋文丛”不是没有遗憾，但总的来说基本符合我的设想。

期待更多朋友的加入！

张 柠

2011年12月6日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自序

我的文学体验历程

我属于“六十年代”，这种出身先天性地将与荒芜和空虚联系起来。孩提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文学经典，我的极其有限的阅读只能来自那些同样荒芜的语文课本和连环画。直到今天，我还对那些来自“书香门第”的作家学人心生艳羡。20世纪90年代中期，身居台湾的伯父第一次跨越海峡，带来了关于我不在人世已半个世纪之久的祖父的消息，我才知道，原来我家族的先辈早在1940年代就撰写过《中国诗歌史》，晚年又有《金刚经解说》，不过，这迟到的信息已无法弥补我童年的遗憾，只能给人某些缅想的线索而已。“六十年代”，那样的荒芜属于整个国家。

荒芜时代的些许色彩其实是格外重要的。感谢我小学时代的政治老师，一位从来不讲政治话题而把课堂变成小说连播的老太太，《三探红鱼洞》的阶级斗争主题远远不能掩饰其中的奇异的想象；感谢我的二舅，一位优秀的数学教师，同样拥有优秀的故事讲述天才，《西游记》与《封神榜》的幻想世界足以令人着迷；1980年代初的应试教育，没有“文学”只有“课文”，幸好还有“作文”来延续我刚刚被激发的幻想。我最早发表的文字也不是“文学”，而是一些数学题的证明问题，但我最终没有沿着二舅的数学道路走下去，因为高中文科班相对轻松的学习任务和文学环境似乎让我找到了更为适应的氛围。

真正深入文学的世界是大学本科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我突然对新诗入了迷，在图书馆里读着一本又一本的现代诗集，甚至自己也开始在纸上涂

抹起来。在这期间，谢冕先生应蓝棣之老师之请来北师大演讲，那带着“朦胧诗论争”岁月所特有的情绪和在此以后蓝棣之老师同样富有情绪感染力的“现代诗”选修课更是大大地增强了我对诗歌的兴趣。不过，此时此刻的诗歌与文学之于我完全是情智的连通，一切与“学术”无关。现在想来，这种较长时间的自由幻想与自由情感的历史，倒是与当今某些功利主义的教育拉开了距离，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情感体验”的意义，这难道不就是一种幸运，甚至一种财富？

我的“学术”之路的开启缘自王富仁教授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那篇著名的《呐喊彷徨综论》。1980年代震动中国学界的这篇宏论曾经掀起了怎样的思想风潮！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晚在图书馆阅读《文学评论》之时那份不可遏止的激动。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一种真真切切的极具思想力度的“学术”的逻辑，哦，原来，真正的“学术”也可以像诗歌一样的动人心魄！几个月之后，我鼓足勇气，将自己的处女作《论〈伤逝〉与现代世界的悲哀》呈到了王老师面前；一年之后，更将一篇3万字的长文《论中国现代新诗的进程》送到了《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信老师的手中。这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名作欣赏》与《文学评论》之上，我也从此宿命般地走上了文学研究的“学术”之路，而且始终都兼有两个方向：鲁迅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问题，但无论是哪一个方面的学术思考都再难脱离“文学体验”的基础，而且越是到后来我越能够感受到这一点。

我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研究最初是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进入的，这里显然昭示了1980年代宏大叙事的影响。不过，我自己倒是比较偏爱那些关于个体诗人和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在关于郭沫若、徐志摩、李金发、卞之琳、何其芳、戴望舒、艾青、绿原、穆旦、梁宗岱等人的研究中，我都努力通过自己的文学感受提出一些与过去迥然有异的想法：郭沫若的内在矛盾，徐志摩的重构古典情趣，李金发的心态扭曲，卞之琳的中国式理性，戴望舒的世纪病，艾青的叛逆，绿原的童真，穆旦的反传统姿态，梁宗岱宗教意识的限度，等等。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某些“文抄公”们的自毁声誉的行径，文学

作品的阅读鉴赏被许多人看成是一件简单而没有多大意义的工作，文学的研究也越来越与这些“低层次”的阅读活动无关。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些文学批评，它们的整个思想框架显然是直接取自另外一个更为宏大的思想系统，仿佛是为了证明这种思想的合理性，文学作品被随手拈来当作了“例证”。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于，如果文学批评、学术研究的“思想”不是从作品内“蒸发”而出，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最终与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没有关系，那么这样的“学术”其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其实，批评家的意义正在于他能对文学作品提出与众不同的独特感受，“思想”也就是对“感觉”的升华。当然，纯思想的探索自有其价值，问题在于所谓的“纯思想”并不是我们所误解的纯粹逻辑层面上的推导，它实际上依然是思想家对世界新鲜、独特的“感受”的结果，只不过由于他所感受的对象本身的某种宏观性、抽象性而使得这些描述方式也呈现出了某些更为抽象的理性样式，尽管如此，这与那种纯粹逻辑层面上的语言游戏依然具有根本的差异。

我坚持认为，文学作品的鉴赏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低层次”的活动，而且它恰恰就是所有文学研究的最坚实的基础。基于这样的观念，我一向重视文学阅读和鉴赏，在诗歌研究之外主编了《中国现代诗歌欣赏》一书，集中总结了一系列的鉴赏心得，在国内同类书籍中，自认为这是相当有特色的一本；多年来，但凡有师友“拉差”参加“鉴赏”书的编写，我大多是不曾拒绝的，王富仁老师主编《闻一多名作欣赏》，我主动承担了近15万的文字任务；此外，还曾与段从学兄合著过《穆旦诗歌鉴赏》，可惜因为出版社方面的原因，已经完成的书稿一直搁浅至今。正是这样细致的文学阅读给了我比较丰富的艺术体验，推动我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家的精神世界，我认为这才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财富。

关于鲁迅特别是《故事新编》的阅读是我最难忘的经历。那是1980年代末的一个深秋，我所在大学积极的“支教”运动将我输送到了四川渠县一个不通公路的乡村。每天晚上，我都蜷缩在一张窄小的课桌前阅读鲁迅。外面是深深的夜影，鲁迅作品是那所乡村学校里最容易找到的借阅书籍，在经历

了那一年燥热的春夏之后，文学与人生的“互训”有着怎样一种铭心刻骨的记忆啊！在我的遭遇与《故事新编》的图景，还有鲁迅的忧愤反讽之间的深刻关联似乎无须太多的解释和说明。一篇又一篇地阅读之后，我记录下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心动。在被浓密的夜色所包裹的灯光下，我曾经将这些阅读的体验低吟给身边新识的朋友，然后在第二天走半小时的田间土路再搭船渡过洲河，通过小镇邮局寄往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没有E-mail的年代，空间的距离令人怅惘，令人孤独，但也给人诸多反观自我的机会。没有电脑快速打字的年代，每一笔文字的刻画都仿佛凝结着人生的见证。文学如何让我们体验人生，人生又如何需要文学的拥抱，20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记忆犹新！

尊重自己的文学感受，将学术纳入到生命体验的过程之中，我们才能有所质疑，有所创立。在“现代性”研究铺天盖地而来，几乎占据现代文学大半个天空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自己的警惕，《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便来自我返回中国文学自身场景的真切感受，《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也试图更为具体地展示文学体验之于学术研究的有效性。未来的思考还可以延伸得更远，比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这些理所当然的历史命名方式：“二十世纪”毕竟结束，正在展开的“二十一世纪”是否就与“二十世纪”迥然不同了？我们是否又到了重新命名的时候？有人试图以“现代”一统江湖，将“现代文学”的称谓延续到今天，统称“中国现代文学”或“现代中国文学”，但新的问题恐怕是：“现代”是不是一个可以无限继续下去的概念？而且，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与文学发展过程中，显然存在着并不一致的文化格局、思想状况与艺术趣味，我们又如何更准确地描绘出它们的差异，甄别其个性呢？先秦—两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固有的记时模式是否还有它特殊的效果？我们还能不能在回到自身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重新辨析自己的命运？我正在致力的“国家形态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命名”思考显然更需要完整深入的文学体验。

以上说的都是“文学”，那么，真切的感受和体验，对我们的更大的人生还有作用吗？显然，这些“灵虚”的沉淀尚不足以结束现实的“蜗居”，

构建生存的高楼大厦，也不能够直接转化为“金榜题名”或者“光宗耀祖”的能力，更无力包揽民生的改进和制度的创新，社会和我们的思想都最终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处理”。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感受和体验是让我们恢复基本的触觉，从而学会“辨认”世界、“把握”人生的第一步。我想起了诗人穆旦的《被围者》：

这是什么地方？时间
每一秒白热而不能等待，
堕下来成了你不要的形状。
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灿烂的
焦躁，到这里就成了今天
一片沙砾。我们终于看见
过去的都已来就范，所有的暂时
相结起来是这平庸的永远。

“包围”“围困”是既有的社会环境对初生生命的一种同化方式，在始终强大的环境中，“被围”的我们注定了陷落的命运，向权威低头，对秩序妥协，在平庸中满足，磨损的是理想，消亡的是信仰，增长的是狡黠，而所有这一切改变的展开，都无不以我们麻木但原本敏锐的感受为前提。不甘于平庸，不蜷缩于被围，这就需要复活我们的感知，提取我们真切的体验，犹如鲁迅当年在S会馆对话金心异：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所忧虑的是感受复活了，却未必真能从“被围”中脱身，“绝望

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而金心异却还在守望着“希望”，因为像他那样的“新青年”还不愿意否定“突围”的可能。1945年的穆旦也具有这样的“新青年”气质：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
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更坏：
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泥土
才会来骚扰，也许更寒冷，
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
我们消失，乃有一片“无人地带”。

穆旦宁可以以自我的牺牲来造成“包围圈”（“圆”）裂隙，这可谓是一种悲壮的突围，即便不是“我”也一定有未来的“他们”完成最后的突围。

想到这些文字，我不禁也对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份遐想，也多了一份希望，也许，还多了一点力量。带着对“突围”的想象，那么，让我们回想自己的“被围”，让我们保有自己的真切感受和体验。

李 怡

2011年5月

目录

总序 / I

自序 / I

国学与软实力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答人民网记者问 / 003

启蒙告退与国学昌盛 —— “国学热” 观察之一 / 007

“国学”之新与旧 —— “国学热” 观察之二 / 011

对抗思维与国学 —— “国学热” 观察之三 / 015

软实力与硬道理 —— “软实力” 讨论的观察之一 / 019

“软”中如何带“硬” —— “软实力” 讨论的观察之二 / 022

我们如何讨论“软实力”？ —— “软实力” 讨论的观察之三 / 029

文学与人文

现代与传统：为什么被误读？ —— 我的一段文学遭遇 / 035

“寒冷”的真相 / 038

语文与我的人生快乐 / 041

完善我们自己的“知识社会学” / 045

世界知识与地方性知识 / 048

为什么需要中国现代文学？ / 056

我们为什么接受了这样的文学格局？ —— 文学史教育与多民族文学问题 / 063

神马都是传统 / 069

何处的汉学? 怎样的慌张? / 077

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三大难题 / 083

什么诗歌? 谁的社会? ——困惑于“诗歌与社会”的讨论 / 088

近“三十年”中国新诗“伪问题” / 095

十七年文学研究: 为什么如此“热”? / 099

巴蜀经验与本土文学

“中心”北京与“外围”巴蜀 ——中国文化结构一瞥 / 107

“巴蜀学派”可以期许否? / 118

巴金逝世与五四的终结? ——与毛讯对谈 / 127

百年艾青与中国新诗的精神传统 / 136

在合川讨论路翎的意义 / 140

白沙码头·重庆性格·莫怀戚 / 145

古琴与画梦中的自我迷醉 ——张于的《手写体》 / 152

历史现场与民间记忆

为什么是“二十世纪”? ——严家炎先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 159

另一种意义的“重返八十年代” ——《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 / 166

西方还是本土: 中国诗学研究的世纪性命题 ——谭桂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 / 170

是什么打动了我们? ——浓妆淡抹的《第一最好不相见》 / 177

共和国历史中的民间记忆 ——《我的一生·跋》 / 180

后记 / 183

国学与软实力

-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答人民网记者问

- 启蒙告退与国学昌盛

- “国学热”观察之一

- “国学”之新与旧

- “国学热”观察之二

- 对抗思维与国学

- “国学热”观察之三

- 软实力与硬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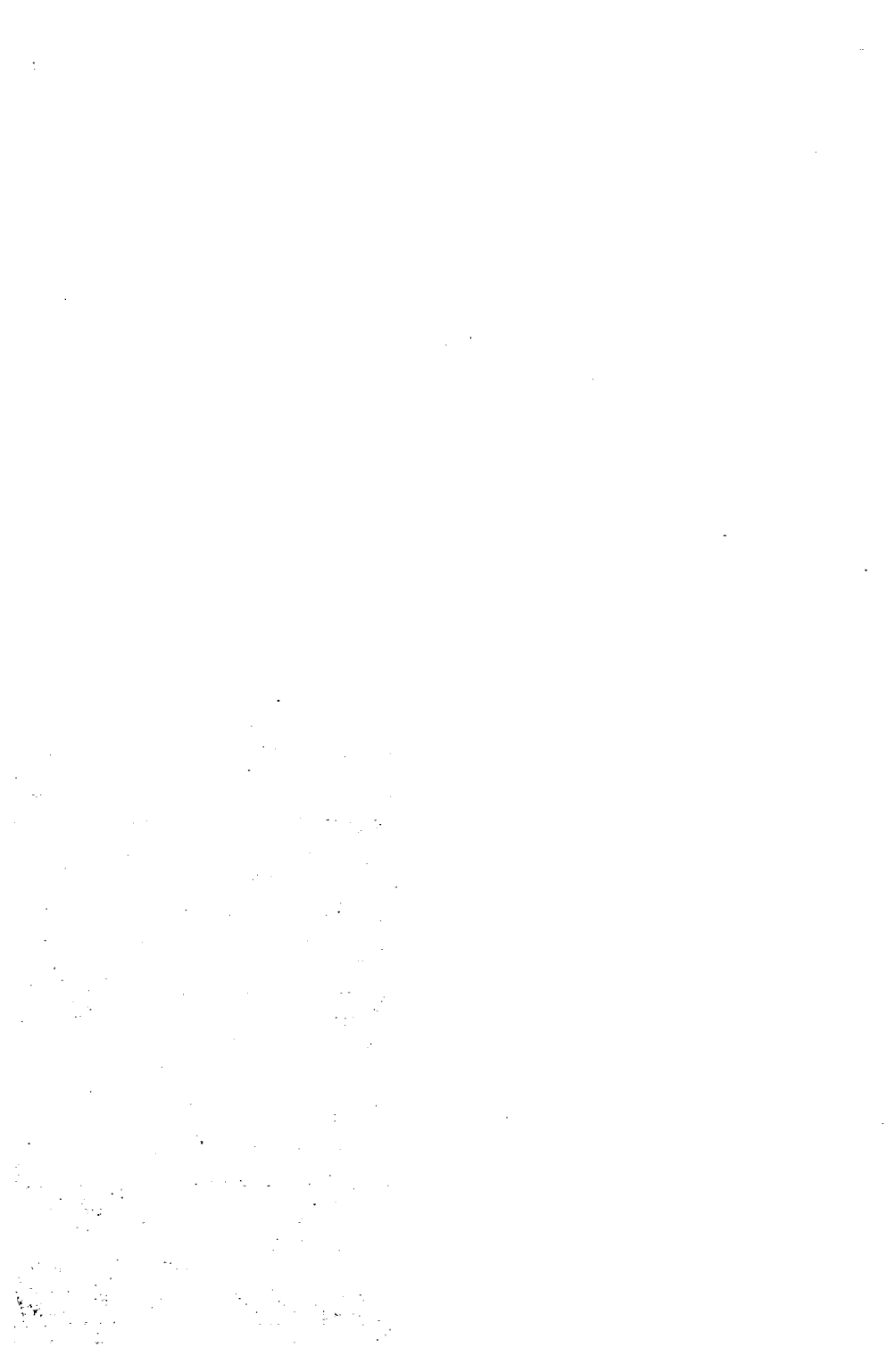
- “软实力”讨论的观察之一

- “软”中如何带“硬”

- “软实力”讨论的观察之二

- 我们如何讨论“软实力”？

- “软实力”讨论的观察之三



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答人民网记者问

编者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各个行业都掀起了纪念五四的高潮。五四精神历经90年的岁月显得更加生动和鲜活，同时也伴随着激烈的争辩。五四运动对于当代中国仍然有着强烈影响，有人高赞五四的批判精神，有人却认为其为文化“断裂”的根源。如何合理评价五四精神、五四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厘清对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的认识，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怡教授。

记者：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水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历史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五四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怡：作为青年学生运动的五四，是中国人第一次将自己当作“国家公民”，通过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的“民意”并最终取得成效，这是划时代